

陈志明/著,罗左毅/译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 以马来西亚为例(下)

人类学研究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下) / 陈志明 / 著 罗左毅 / 译



[作者简介] 陈志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

[摘要] 运用马来西亚的事例强调了族群性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涉及不同族群的政治程序的重要意义。族群的形成涉及一系列的过程,这些过程使人们在一国家内意识到一个共同想象的社群。创制族群和国家认同的过程实际上构成了同一历史过程的重要部分。在一国家范畴内,不同的族群对国家认同有不同的憧憬,因此有必要将国家认同与族群性相关联思考。论述了马来人和华人的族群划分问题以及沙捞越土著人复杂的族群认同意识和族群形成问题。

[关键词] 族群认同;国家认同;民族主义;原住民;马来西亚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
(2002)06-0023-10

Ethnic Identitie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TAN Chee-Be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Using examples from Malaysia,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relating ethnicity to the power of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involvi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e processes that create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are part and parcel of the same historical process. The paper also describes Malay and Chinese ethnicity as well as the complex ethnic identification and ethnogenesi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Sarawak.

Key Words: ethnic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ethnic nationalism, indigenous peoples, Malaysia

(接上期)

七、非语言共同体的族群 划分:比达优人

就

比达优人来说,其形成与陆达雅克人的分类有关。比达优人发展成为一个族群非常有趣,这一点与伊班人不同,他们之间有不同的语言。例如,石隆门地方的比达优人可能就不十分理解内地帕达万比达优人的方言。笔者有学生是

比达优人,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地区,但彼此之间说马来语,“比达优”这一标识含义为“内地人”,他们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已认可了这一标识。当初这一标识为沙洞地区的人们所使用(Geddes 1954:6),从前称为“陆达雅克人”的人们今天已自认为比达优人。布鲁克当局将这些语言彼此不同的人统一用一个范畴来归类,从而也就规范了其发展的前景。这些人集中居住在第一行政区(即现在的古晋行政区),他们需要与伊班人的控制进行交涉,因此这些

人有形成某种族群认同意识的动机。今天,他们已自视为属于比达优人族群,笔者的走访和对比达优人社区的调查以及与比达优学生的交往都说明了这一事实。交通的便利、市镇中学和大学的普及以及大众媒体包括比达优语广播节目的推广,所有这些都推动了比达优人共同族群认同意识的形成。

达雅克比达优民族协会(DBNA)在现代的国家体系内为加强比达优人共同的认同意识以及在阐发比达优人的利益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协会1955年成立时原名为比达优民族协会,它是在马来民族联盟和沙捞越达雅克人协会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些组织都参与了抵制转让的运动。比达优人深感有必要将自己组织起来,其中有一位杰出的领导人甚至将其描述为“比达优民族主义”的胚胎(Ridu 1989)。沙捞越达雅克人协会致力于代表伊班人和比达优人的利益,可是有着长期抵抗伊班人控制(其过程与布鲁克执政前时期的猎人头的习俗有关)的比达优人却致力于建立自己的组织,这使比达优人的族群认同意识得以彰显,尽管比达优人也被称为达雅克人。该协会强调对比达优人的教育要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经济生活也要进一步改善。1991年笔者从事有关的研究时,该协会的领导人皮特·米诺斯,他一身兼三任(律师、商人、从政者),这时的协会已与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土著保守党(PBB)结盟,其性质与被执政党视为反政府的沙捞越达雅克人民族联盟以及沙捞越达伊班达雅克人协会不同。从这里我们看出比达优人作为少数民族在与国家打交道时选择了不同的策略,因而他们的协会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包括不少的教育拨款在内。皮特·米诺斯作为一名土著保守党党员虽然遇到了来自比达优社会内部的反对意见,但他一直大力倡导比达优人的团结,经常在报纸上撰写有关比达优人问题的文章。有一次在采访他时(1991年5月21日),他谈到了比达优人的贫困问题以及他提倡的从自给自足的农业向商业贸易的农业转变的必要性。他曾这样写道:“我一直钦佩美拉闹人,因为我从心底里认为我们的社会是土著社会中的一个微小部分,面对艰难的生活现实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也应该向他们学习”(Mions 1989:84)。从这里我们看到,在一个国家内来自某一族群的个人会对另一个族群的成就表示钦佩,同时这种情况也影响了他们自身族群的地位。

八、历史隔离与族群划分: 巴登人和奥兰乌鲁人

就肯亚人(Kenyah)来说,我们发现其族群形成

的过程不仅涉及不同的肯亚群体(例如巴登人)在与国家相对下自我认同为一个群体而且也涉及认同一个较为宽泛的“想象群体”。肯亚人的情况表明,族群的这种变化实际上涉及如何通过与国家的互动将小型的社群联合组成更加稳定和强大的群体。

在沙捞越,教育、大众媒体,特别是物质交流的改善(公路、水路和航空)以及行政的集权都有力地推动了各地人民之间的政治和民族交往。沙捞越的绝大多数土著人从前虽然与临近的社群有联系,但事实上他们的认同意识只是从具体的村落社会角度着眼的。各个村落社会的名称或者认同意识渊源于河流或者其他相关的物质性特征的名称。例如,绝大多数肯亚人村落的名称与河口有关,像龙布兰、龙耕、龙顿甘等,“龙”的意思就是河口。

巴登人是肯亚人的一支,其名称源于位于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的巴登河口两岸的龙巴登。巴登人居住在婆罗洲岛称为中央婆罗洲的那一块地区(Rousseau 1990)。巴登人的神话和口传历史讲述了他们的发祥地位于边界地区沙捞越一侧的乌狮阿包(Vom Roy 1993)。巴登人今天分布在边界地区两侧,也就是说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他们都有分布。巴登人的神话和口传历史都说明了肯亚人当初为一个民族,但随着各地人口的增长或者由于冲突,人们之间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村落。怀特尔(Whittier 1978:93)认为肯亚人发源于东加里曼丹卡央河的支流伊湾河的上游。由于“人口膨胀和族群之间的战争”,他们从那里发生了分化。经过多次迁移最终在中央婆罗洲的不同地区出现了许多语言上相关的人群,组建了他们自己的“乐坡”,也就是村落社会。今天肯亚人的这种群体为数不少,像“陶乐坡”(Lepo 'Tau)(绝大多数在印度尼西亚)、“巴登人”、“库利特乐坡(Lepo 'Kulit)”等等。举个例子,巴南(位于沙捞越)龙吉(Long Jeeh)的阿音乐坡(Lepo 'Aga)的肯亚人说的语言与贝拉加(Belaga)地区的巴登人说的语言基本相同,彼此之间的差异微乎其微。罗叟(Rousseau 1975:36)将沙捞越贝拉加地区的肯亚人描绘成“拥有共同渊源的亚群体”。不过,我们必须将他们的族群认同看成是一个与国家相关的过程。

沙捞越的巴登人在贝拉加地区(巴雷河流域)和巴南河盆地为河流和山脉所隔离,即使在今天除非在较大的市镇上相遇彼此之间也极少交往。贝拉加的龙布桑(Long Busang)、龙门家瓦(Long Merr

笔者在此要感谢多丽斯·安妮·丝高小姐提供的有关阿音乐坡人语言的情况,她生于龙吉,是贝拉加县乌马达若长屋的基督教传教士。

jawah)和龙顿甘(Long Dungan)以及位于民都鲁省的达塔卡库斯(Data Kakus)的巴登人属于由加里曼丹一侧迁移而来的群体,因此他们有亲缘关系,而龙耕(Long Geng)的巴登人也是由加里曼丹的同一祖先派生出来的,不过迁移到沙捞越的时间更早。尽管如此,贝拉加所有的巴登人今天自视为同一族群。这种情形由于内地贝拉加集市对巴登人和所有肯亚人以及贝拉加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的推动作用而不断加强。

过去,各地的肯亚人分为不同地方社区的群体,然而今天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却使巴登人和所有的肯亚人逐渐形成较为宽泛的认同意识。目前贝拉加的巴登人看起来好像已经形成了某种独特的族群,然而马来西亚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正促使所有的肯亚人形成某种宽泛的“肯亚人”认同意识。事实上,对非肯亚人来说,所有的肯亚人群体都是肯亚人,尽管他们彼此之间有些自视为巴登人、乌玛库利特人(Uma Kulit)、参波普人(Sambop)等等。

沙捞越各地的肯亚人和卡央人(Kayan)的领袖们实际上深感有必要将全部“中央婆罗洲”的少数民族群体联合起来,以形成与伊班人、比达优人以及穆斯林群体相对照的较为宽泛的某种范畴,从而使沙捞越内地小型族群的利益能够得到有力的阐发。因此,一些来自巴南的卡央人和肯亚人的领袖于1966年组建了奥兰乌鲁民族协会(OUNA)，“奥兰乌鲁”(意思是上游地区的人)涵盖了一切内地的群体,包括卡央人、肯亚人、色卡盘人、贝拉湾人等等。然而,并不是所有按此划分的群体十分愿意与奥兰乌鲁(Orang Ulu)这一范畴形成认同,有些群体像克拉比特、伦巴旺和比沙亚甚至本南人(Penan)事实上早就有了自己的族群社团。奥兰乌鲁所涵盖的族群很多,而肯亚人和卡央人为最大的群体,被视为控制了奥兰乌鲁民族协会。实际上,只是在像古晋(沙捞越首府)这样连卡央人和肯亚人也为数不多的大城市里,奥兰乌鲁这一标识才被源自内陆的不同的少数民族自己和外界人士所使用。在古晋,卡央人、肯亚人以及其他内地的少数民族觉得自视为奥兰乌鲁人并与奥兰乌鲁民族协会形成认同是非常有用的。奥兰乌鲁民族协会在与国家交往以及与伊班人、比达优人、穆斯林群体和华人打交道时代表了奥兰乌鲁人的利益。

一个国家的发展性质也可能促进人们在族群观念的基础上形成强烈的认同意识以宣示族群的利益,积极参与社会经济的竞争。例如,在沙捞越,伐木是直接影响到从政者们(尤其是穆斯林的从政者)和资本家利益的经济活动。因此,土著的少数民族群体感觉到迫切需要组织起来以联合保护自己

的经济利益并争取补偿森林资源的流失。事实上,原住民族群社团的成立是与伐木活动相关的。1988年一群皮南人在马来西亚大地之友这个环保组织的协助下组建了一个社团,名称为沙捞越皮南人协会,目的是就伐木事务采取联合行动并就政府漠视他们的疾苦发出呼吁(Brosius 1999; Tan 1994:149)。协会是由来自巴南图托地区的皮南人组建的,但它能否联合散居在沙捞越内地不同地区的皮南人成为一个共同的“想象社群”,人们还要拭目以待。

九、个人、国家以及族群划分

除了族群关系及其认同之外,还有必要审视个人层次和人际层次上的族群划分。事实上,族群的认同是公共的,是由公众来评价和确认的,而这一切又会影响人们对自己认同意识的感知。在马来西亚,族群的划分是十分明确的,它要在出生证上进行登记,族群的认同意识也由马来西亚社会的性质所强化,这个社会的政治是按族群进行组织的,每一个政党都以族群为基础,鲜明地代表着某一个或几个族群的利益。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经济机遇的竞争是在族群之间展开的,族群划分、族群认同以及族群的情感是非常强烈的。世界观早已族群化了,谈论与人相关的事件不提及族群的地位是不全面的。例如,说到某人淹死了还不够,人们还想知道淹死的人究竟是华人,还是马来人或者印度人,否则谈论的事是不完整的。在马来西亚,这种强烈的族群意识除了一些表型不很明显的混血儿外,对于绝大多数的马来西亚人来说是不成什么问题的。从理论上说,外貌像印度人而其父亲为华人母亲为印度人的人根据父系原则应属于华人,但是这种人在社会交往中可能会遇到族群认同意识的问题。在马来西亚,单说是马来西亚人还不够,还必须具有某种族群的认同意识。

因此,绝大多数的马来西亚人都有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华人经常谈论马来人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以及他们自己对政府部门(包括半官方机构和大学)中存在的种族歧视的感触。华人也议论在大学入学、领出租车执照、升职等方面存在的对华人的歧视,他们对马来人控制政府部门以及半官方机构中几乎所有决策位置(比如政府各部的主任)的现象也颇有议论。马来人仍然认为华人在经济上占有主

主要沿海而居的马来人长久以来就已使用“奥兰乌鲁”这一称呼指内地人,但是“内地人”自己使用这一称呼却是最近的事。不过,英国政府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使用了这一称呼,例如,“1957年奥兰乌鲁罚金习惯法令(贝拉加县)”(见 The Sarawak Government Gazette XIV(19)1959,第No. S32条)

导的地位,而且普遍要求继续给土著的优惠政策。虽然如此,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一直相当不错。在群体层次上存在的结构性冲突在个人层次上得以认真地回避,因此华人在与马来人交往时,通常避免谈论马来人的控制或者种族歧视这样的问题。

对马来人的政治支配的批评在“大地之子”范畴内的土著群体中也日益彰显。在沙捞越,伊班人觉悟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认识到必须大力倡导在大地之子范畴内的政治参与意识。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种情势导致伊班人的活跃分子以及他们的各种非政府的组织与政府形成了直接的对抗。在沙巴,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形,那里最大的非穆斯林族群卡达赞人反对马来人的控制,要求赋予卡达赞人更多的机遇。1985年卡达赞人终于得以领导州政府,但在1994年的州竞选中局面又由巫统(UMNO)领导的联盟所控制。罗国华(Loh 1992)将这种种族民族主义描绘成反对霸权的形式,指出它进一步加强了卡达赞人的族群认同意识。就笔者与众多伊班人和卡达赞人的交往来看,这种族群认同的意识是司空见惯的,尤其是当他们抱怨政府中的穆斯林从政者与他们自己族群中的从政人员数目相差悬殊时更是如此。

那些其“想象社群”的观念即我们所称之为族群的观念尚处在形成时期的人们的认同意识又怎样呢?笔者对巴登人的研究可作为一个例子。贝拉加地区的巴登人自认为巴登人。他们称那些非“奥兰乌鲁”群体的人特别是那些从其他地区来的人为“阿娄”(alo),意思是“陌生人”。但是,卡央人和色卡盘人(贝拉加的土著人)没有被称为“阿娄”而是被称为“萨凯”,意思是“客人”。来自古晋(沙捞越的首府)的华人和马来人也称为阿娄。阿娄的称呼在许多情况下用来指群体之外的人。例如,“阿娄肯姆”(alo kem)指来自伐木营地的人,“阿娄塔班”(alo taban,塔班是“药”的意思)指的是健康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欧洲人或者白人也不叫“阿娄”,而是称为“图恩”(Tuen,马来语为图安),这一称呼当年是用来指当权的白人官员。今天即使是白人旅游者也被称为图恩。

对于其他肯亚人群体来说,巴登人自认为巴登人,需要强调共同肯亚认同,他们也会称“肯亚人”,但是在肯亚人当中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族群标识。对本地区的非肯亚人比如华人以及来访的政府人员来说,巴登人通常自认为是“肯亚人”,沿海市镇以及贝拉加地区以外的情形也如此。因为“巴登人”这一标识很少有人知道。实际上,在诗巫(Sibu)和民都鲁(Bintulu),市镇居民对卡央人的了解比对肯

亚人(他们的居住区位于沙捞越的偏远部位)的了解要多,人们会认为肯亚人就是卡央人,因此为方便起见肯亚人在个别场合会说自己是卡央人。例如,笔者1992年5月采访了一位来自民都鲁内地达塔卡库斯的年轻巴登人,他在民都鲁一个海滨小镇工作。他告诉笔者,在民都鲁他面对那里的华人和马来人会自称为卡央人,因为只有这一标识为人所知。据他所说,在美里(Miri),很多肯亚人来自巴南河盆地,而城里人一样都非常熟悉“肯亚人”这一标识,因此在那里他会自称为“肯亚人”。这一事例说明小型的土著人群体会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便利的标识来表达自己的认同意识。这并非假冒别的族群,也不仅仅是情景性族群意识,因为即使是在市镇里,巴登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卡央人。他们只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解释而情愿被称为卡央人的。

就马来人、华人甚至伊班人、比达优人和卡央人作为族群的含义来说,“肯亚人”至今还只是一个“范畴”而不是一个族群。与巴登人的交往使笔者感到贝拉加的巴登人的确在自视为一个群体,他们与巴南的巴登人的交往日趋频繁。我们正目睹着马来西亚肯亚人族群的建立过程,肯亚人很有可能成为族群,而不仅仅是某种宽泛的种族范畴。随着马来西亚社会大环境中肯亚人群体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肯亚人”认同意识的便利也许会导致形成肯亚人族群。但是肯亚人的群体也有可能只是如巴登人在某种特定层次意义上的族群。20世纪90年代初期笔者研究有关的问题时,有几位受过教育的巴登报人就谈论要建立一个巴登人的社团。巴登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凤毛麟角,这些人有可能成为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对现代官僚体系的运作会有更多的了解,能有钱赞助成立社团的巴登商人也没有。如果将来巴登人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社团,他们就有可能以族群的面貌更加显著地出现在世人面前。另一方面,也有些巴登人和其他肯亚人群体的成员认为,鉴于他们自己的数量在马来西亚太小,让一个肯亚人的社团代表他们的利益其意义会更大。

然而,笔者对巴登人的研究以及对贝拉加不同“奥兰乌鲁”群体的走访都表明,即使是位处内地极为偏远的群体,不管他们族群的形成目前处于什么

在本次选举前的一次有趣的进展是马来政党巫统在沙巴建立了分支机构,这样一来,非马来族的土著人即使不是穆斯林也可以加入马来人的政党,从而使马来半岛上的马来人“大地之子”的观念有所松动。马来半岛是巫统以及马来民族主义的大本营,在这里只有葡萄牙裔的马来西亚人和马来西亚籍的泰人才能获得有限的大地之子的地位,允许参与只开放给土著的国家投资计划。

此处的有关情况来自笔者1992年6月和7月在贝拉加县龙顿甘和龙布桑两地进行的采访。

样的阶段都认同于“马来西亚”。这不仅仅是政府宣传(例如通过宣传部门在长屋举办公民班)的结果,也是教育、人口出生登记和国家统治的产物;这些人们也愿意成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要求提供便利设施(例如健康服务中心、学校、农业补贴等等)以及更多的机遇。笔者1992年走访龙布桑的巴登人时,发现他们中有许多人表示很难获取身份证,而马来西亚政府是要求年满12周岁的所有公民持有身份证的。由于这里的居民区地处偏远,他们很多人没有在孩子出生时进行登记,而且他们是1970年才从加里曼丹迁移过来的(Vom Roy 1993:52;Armstrong 1994),因此他们向政府申请身份证时绝大多数是得不到批准的。像哈罗德·爱德海默(Harald Eidheim 1985:157)论及挪威的撒阿米人时所指出的那样,土著人将国家社会体验为不仅“是多数民族给少数民族施加的一整套繁琐的规则”,而且“是某种提供与自己的生活必不可少的机遇(工作的机遇、健康服务以及教育等)的力量”。国家认同的产生不仅要借助国家的司法力量而且也要通过国家组成部分的人民的意愿,即使他们会抱怨政府以及资本家对他们土地和资源的侵扰。与国家融为一体的过程铸就了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发展。

与国家形成认同对民族的产生和族群认同的影响还有另一个方面,即与属于另一个国家相似人们区分开来。当代的巴登人是从加里曼丹迁移过来的。他们今天仍然可以与印度尼西亚的人们追溯起亲缘关系。由于马来西亚的工资较高,许多印度尼西亚的土著人包括巴登人来到马来西亚的伐木营地工作。在与加里曼丹最近的贝拉加的龙布桑村,巴登人和其他一些来自加里曼丹的肯亚人(例如陶乐坡人和巴孔人)历来在巴登人的村子里共同居住。虽然村民们愿意帮助这些人甚至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保护以规避马来西亚当局,但是人们还是意识到各自国籍的差异。这种与国家保持认同的意识形成了以国家为划分基准的族群和国家认同所表述的族群划分现象。

笔者在马来半岛以及东马来西亚都有过生活和研究的经历,我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沙捞越的族群现象,特别是在“奥兰乌鲁”群体之间,与马来半岛较排外态度的情况不同。在沙捞越即使从身体外表来看,也常常难以分辨某一群体成员与另一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异:巴登人看起来可能像卡央人而克拉比特人看起来像华人。由于伐木使土著人之间接触频繁(在同一伐木营地共同工作),彼此之间的通婚现在也越来越多,即使在沙捞越内地也是这样。例如,与巴登人结婚的卡央人就被认可为该社会的一名成

员。再举一个例子,在克拉比特人(Kelabit)中,与克拉比特人结婚的外族人通常也被看成是“克拉比特”人。笔者认识一位比达优人的领导人,他与一名克拉比特妇女结了婚,他对称为“沙捞越如濡姆克拉比特人协会”的克拉比特人的社团之成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90年5月笔者走访克拉比特高原时,发现一些克拉比特人是从加里曼丹过来的克拉延(Kerayan,与克拉比特接近的一个族群)移民,不过当地人允许他们与克拉比特人形成认同意识,以便成为马来西亚的公民。比沙亚人(Bisaya)绝大多数为基督徒,也有一些穆斯林和传统的比沙亚宗教的信徒,但他们都参加彼此的宗教庆典活动也参加马来人的庆典活动。在马来半岛,马来人通常是不参加非穆斯林的宗教庆典活动的。在沙捞越的这种良好的社会关系,反映了该州与马来半岛相比族群关系相对和缓。在马来半岛的马来人和华人之间有较长的历史和强烈的种族政治,包括建立国家认同的政治。

十、后殖民主义时代与多元民族国家

在后殖民时代的国家里,采用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共同的民族历史认同的模式是不切实际的。的确,像马来西亚这样战后独立的社会只能建设一个多元化的民族国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发展起来的马来民族主义继续在战后和独立后的时代影响马来西亚国家认同的形成,使得马来人在政治经济上占主导地位。华人和印度人对马来人的民族主义的反应是建立在对其经济利益和文化权力进行限制的恐惧基础之上的。非马来族的土著人关心的是他们自己与马来人和华人相比在国家中的地位,尽管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时期更为关心的是在“大地之子”范畴内的公平权益,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论述。族群之间的竞争和磋商是由相关的族群中的精英们(从政者、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商人等等)操纵的。形形色色的政治过程规范了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发展。

我们已经看到马哈蒂尔总理对推动现代资本主义性质的马来人的认同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成功以及马来人在马来西亚政治中所占据的支配地位,新经济政策已为国家发展政策所取代(1997~2000),这一新的发展政策融合了马哈蒂尔的2020年的发展宏愿,旨在使马来西亚在2020年前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到了20世纪的90年代,文化政策变得比较自由,马哈蒂尔甚至呼吁建立“马来西亚民族”。按照他的说法,“马来西亚民族

指的是能够将自己与国家密切联系起来的民族,能操马来语(国语),承认宪法。”为了实现马来西亚民族这一目标,马哈蒂尔写道,“人们应当彼此之间相互尊重,不论种族和宗教信仰为何”(Shamsul Akmar 1995:1)。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尽管为马来人所控制,但马来西亚民族已经出现。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种话是由一位杰出的马来人的从政者说出来的。正因为这一观念带有多元文化的色彩,华人对此是欢迎的。但是马来人的反应显得保守,因为马来人的知识分子阶层担心这会导致出现一个没有明显的马来人认同的国家认同意识(Lohv 1997)。马来西亚国的想象仍然以族群划分为主。

族群的产生和族群的认同鲜明地与国家以及国家建设的政治过程相关联。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马来人由于与不同的国家形成了各自的认同,也因为生长在不同的“国家文化”中,因而成为不同的民族。在马来西亚,就是爪哇人现在也自认为是马来人或者马来西亚人,而在印度尼西亚,爪哇人作为多数民族却形成了令人骄傲的民族群体。

新加坡的华人与马来西亚华人的区分是另一个可以在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研究中予以考虑的有趣的事例。由于他们与不同的国家形成了认同,马来西亚的华人和新加坡的华人今天都自视为不同的人。他们是不同的群体,其差异源于不同的国家认同意识以及参与了不同的“国家文化”的形成。例如,两国不同的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造就了不同的华人群体。年轻一代的华裔马来西亚人今天说一口流利的马来语,而绝大多数的新加坡华人马来语说得不是很好,因为马来语在新加坡“多元文化”政策中的地位有名无实,虽然它是四种官方语言之一。不同国家存在着华人群体这一现象表明有必要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联系起来。不同国家存在的华人群体并没有组成一个族群,他们也不属一个统一的民族。但是,作为与中华文明在某些方面有联系的人,不同国家的华人可以在人际关系的层次上找到某种认同的文化基础。笔者已提议将这种不以国籍为依据的族群划分称为“文明性族群现象(civilizational ethnicity)”(Tan 1997a)。

近年来的人类学研究著作,像托马斯·哈莱德·爱里克森(Eriksen 1993)以及马库斯·班克斯(Banks 1996)等人的研究,都对族群划分和民族主义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这里所作的探讨表明,如果族群的产生与国家的权力以及国家的建设相关联,那么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发展今天就不过是国家中的族群形成的问题而已。当然,有一些族群仍然在致力于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但在稳定的国

家内,将族群划分与国家相关联并审视不同的族群或者种族如何憧憬视其自身为组成部分的多元化的国家,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事实上,王爱华(Aihwa Ong 1996)对文化公民的研究就属于族群划分和国家权力的研究领域,因为她的分析探讨与国民社会中的国家机关和群体有关。有必要将族群划分与国家认同联系起来,也有必要用多元化的视角看待后者,要看到国家中的不同族群对国家认同的憧憬是多姿多彩的。我们已讨论了马来西亚的有关马来人的民族主义以及国家认同憧憬的有关情况。认真审视西方国家中的类似问题也是必要的。现代的“国家群体”,事实上只是国家中的众多想象社群的一个想象社群,各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有关“国家社会”的文化感知。

民族主义的旧有的观念需要重新加以定义。李奇蒙指出地域参数是“有关‘国家群体’概念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这并不一定与特定国家的疆域相一致”(Richmond 1987:4)。他的这一论点已广为人知,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现代多民族的国家中,每一个族群包括土著的群体在内,都是与有着共同地域的国家内的其他族群相联系的。我们今天论述的是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还有学者仍然认为民族(nation)是指拥有自己的国家的,其实这种情形是很难找到的。艾萨克写道:“日本可能是地球上最纯正的‘民族国家’,它也许是为数不多能够被称为‘单一民族的国家’之一”(Issacs 1975:185)。然而即使在日本,人们也需要考虑阿伊努人、朝鲜族人和华裔少数民族的族群如何看他们的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问题以及他们对自己独特的族群地位是如何感知的。

至于“nation”并不一定与“国家”的疆域相一致这一观点,我们的探讨指明了有必要考虑隶属于某一国家对族群形成的影响。虽然有一些民族如库尔德人(Kurds)为不同的国家所分隔,而且他们仍在为建立自己的国家而奋斗,但人们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在不同的国家中相似的人们应该组成一个民族国家。在马来西亚,已本地化的爪哇人与印度尼西亚人并不属于一个民族国家;而且我们看到华裔马来西亚人和华裔新加坡人属于两个国家的人。同样,世界各地的华人并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民族国家:有华裔美国人、华裔菲律宾人、华裔印度尼西亚人等等。

也许因为有在沙捞越的经历,笔者将族群问题看成是地方社群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由于经济、社会特别是大环境中的政治条件的变化,使人们从小社群成为较大的群体的利益得以彰显发展,此种族群

的显现过程也可能首先是由外部因素强加而成的。当族群的规模较大时,就像马来西亚的华人情况那样,它其实就是一个“想象社群”。由于现代世界是按国家组建的,国家的权力不仅对族群的关系有重大的影响,而且这种权力也会按国家的疆域冠冕堂皇地定义自己的族群界限。经过一定的时间,移民和本土化就会改变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的主观意识。例如,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华裔马来西亚人的子女有可能自认为澳大利亚人,同时也自认为华裔澳大利亚人,而不是华裔马来西亚人。

事实上,定居于另一国家的移民可能在新国家中利用他们原有的国家认同来组织起新的族群,关于这一点西勒在研究美国的海地人的情况时有很好的说明,他的结论是“对美国纽约海地移民形成族群的过程的分析必须涉及美国的政治制度(这是一项独立的变量),同时必须审视来自美国社会的各种压力”(Schiller 1977:34)。国家对族群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带有反实质论特色的后现代探讨模式(Wicker 1977)具有某些新颖的理论洞察力,但对国家作用的忽视却并不真正有助于我们理解族群的形成与发展,也无助于我们了解人们为什么会将他们的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实质化。这种实质论(essentialism)需要的不是予以解构,而是要被看成人们与国家权力关系的一部分加以研究。

最后要说明的是,社会生活事实上是多样化的。群体总是存在的,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有群居的特征。族群的多样化应该得到尊重,有必要建立起群体间竞争时族群的意识非政治化和种族化的世界,人们在这样的世界中得以有尊严的生存。世界各地理应成为诸种文化交流的场合,在这种交流中族群的多样化被视为理所当然并丰富了人类的文化,而族群的认同仅仅反映了不带任何偏颇的意识形态内涵的多样性并得到人们的认可。为达此目的,人类必须致力于实现人人机会均等、社会正义的大同世界。只有这样,族群认同才不必成为人们唤起群体情感(族群主义、民族主义等等)来凝聚内部的团结力量以反对外部真正的或虚构的对手和敌人的象征,或者成为反对国家压迫、帝国主义势力的象征。

族群认同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种族性质的。权力关系以及导向经济机遇的宽泛境遇赋予族群认同以特定的意义和内涵。并不是因为族群认同的出现才导致了族群的极化和冲突,而是因为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以及不公正的社会经济分配才迫使人们按族群进行竞争,从而造就了重新定义有关族群间关系以及竞争的认同意识的需要。因此,在笔者看来,研究族群认同以及族群关系说到底乃是关于我们如何争取平等和正义的研究的一个部分。(全文完)

[参 考 文 献]

- Abraham, Collin E. R.
 1977 Divide and Rule: The Roots of Race Relations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Insan[M].
- Andaya, Barbara Watson and Leonard Y. Andaya
 1982 A History of Malaya[M].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 London: Verso.
- 1992 The World Disorder[J]. 24 Hours Special Supplement: What ever Happened to the New World Order (ABC Radio, Sydney), February: 40 - 46
- Ariffin Omar
 1993 Bangsa Melayu: Malay Concepts of Democracy and Community, 1945 - 1950[M].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rmstrong, Rita
 1994 From Difficult Natives to Good Citizens: Marginality and Autonomy in a Central Borneo Society[J]. ASSESS Journal (Australia): 36 - 47.
- Aseng, Charles Tenggoi
 1989 History and Relationship of Melanau to Other Ethnic Groups [J]. The Sarawak Museum Journal. 61 (part2, special issue no. 4): 189 - 197.
- Ave Jan B., and Victor T. King
 1986 Borneo: The People of the Weeping Forest: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Borneo[M]. Leiden: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Babcock, Tim G.
 1974 Indigenous Ethnicity in Sarawak[J]. Sarawak Museum Journal 22 (43, n. s.): 191 - 202.
- Banks, Marcus
 1996 Ethnicity: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M]. London: Routledge.
- Barth, Fredrik
 1969 Introduction [A]. I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C]. Fredrik Barth, ed. pp. 9 - 38.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Blanc, Cristina Szanton
 1997 The Thoroughly Modern "Asian": Capital, Culture, and Nation in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A]. In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C]. Aihwa Ong and Donald M. Nonini, eds. pp. 261 - 286. New York: Routledge.
- Brosius J., Peter
 1996 Locations and Representations: Writing in the Political Pre-

在马来西亚,人们建立社团必须向政府提出申请,尽管宪法保障结社的自由。但是那些在政府中没有关系的少数民族而又在当代国家中不知道如何阐明自己的权力,那么就很容易为政治部(政府的情报部门)所说服或者受其威胁不要组建社团,要不就被告知没有再成立社团的必要,因为早已存在了一个奥兰乌鲁人联合会。笔者的巴登友人在与当地的政治部人员打交道时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sent in Sarawak , East Malaysia[J]. Identities 6(2 - 3) :pp.345 - 386.
Chandra Muzaffar

1987 Islamic Resurgence in Malaysia[M]. Petaling Jaya Malaysia :
Fajar Bakti.

Chee , Stephen

1991 Consociational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Conflict Regulation in
Malaysia[A]. In Leadership and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 : Institutional
Aspects[C]. Stephen Chee ,ed. pp. 53 - 86. Singapore :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ohen , Abner

1969 Custom and Politics in Urban Africa :Hausa Migrants in Yoruba
Towns[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1995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of Malaysia 1991 :General Re-
port of the Population Census[J] ,vol. 1. Kuala Lumpur :Dept. of Statis-
tics Malaysia.

Eidheim ,Harald

1985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State :The Saami Case in Norway
[A]. In Native Power :The Quest for Autonomy and Nationhood of In-
digenous Peoples[C].Jens Brsted Jens Dahl ,Andrew Gray ,Hans Chris-
tian Gullv , Georg Hendriksen ,Jorgen Brochner Jrgensen , and Inge
Kleivan ,eds. pp.155 - 171.Bergen :Universitetsforlaget As.

Eriksen ,Thomas Hylland

1993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M].

London :Pluto Press

Foucault ,Michel

1980 Posner/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 1977 [A]. Colin Gordon ,ed. ;translated by Colin Gordon ,Leo
Marshall John Mepham ,and Kate Sop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Freeman ,Derek

1955 Report on the Iban[A]. Sarawak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C]. New edition published by the Athlone Press ,London ,1970.

1981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Nature of Iban Society[A]. An Occa-
sional Paper of the Dept[C]. Of Anthropology ,Research School of Pa-
cific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Furnivall J. S.

1948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urma
and Netherlands India[M].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ddes ,W. R.

1954 The Land Dayhak of Sarawak[M]. London : Her Majesty 's
Stationery Office.

Gullick , J. M.

1965 [1958]Indigenous Political Systems of Western Malaya[M].
London : LSE, Monograph on Social Anthropology No. 17.

Issacs , Harold P.

1975 Idols of the Tribe :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hange[M].
New York : Harper & Row.

Jawan , Jayum A.

1987 The Sarawak State Election of 1987 : The Dayakism Factor
[M]. Kuala Lumpur : Jayum A. Jawan.

Jenkins , Richard

1997 Rethinking Ethnicity : Arguments and Explorations [M].
London : Sage Publication.

Keyes , Charles F.

1976 Towards a New Formula of the Concept of Ethnic Group[J].
Ethnicity 3(3) :202 - 213.

1978 Introduction [A]. In Ethnic Adaptation and Identity : The
Karen on the Thai Frontier With Burma[C]. Charles F. Keyes , ed. ,
pp.1 - 23. Philadelphia : ISHI.

1981 The Dialectics of Ethnic Change[A]. In Ethnic Change[C].
Charles F. Keyes , ed. , pp. 3 - 30.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Khazin Mohd. Tamrin

1987 Orang Jawa di Selangor : Penghirahan dan Penempatan 1880
- 1940(Javanese in Selangor : Migration and Localization 1880 - 1940)
[M]. Kuala Lumpur :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Khoo , Kay Kim

1981 Sino - Malay Relation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before 1942
[J].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2(1) : 93 - 107.

King , Victor T.

1982 Ethnicity in Borneo : An Anthropological Problem[J]. South-
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10(1) : 23 - 43.

Lee , Raymond L. M.

1990 The State , Religious Nationalism , and Ethnic Rationalization
in Malaysia[J].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3(4) : 482 - 502.

Lian , Kwen Fee

1997 Between Kingdom and Nation : The Metamorphosis of Malay
Identity in Malaysia[J].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5
(2) : 59 - 78.

Lim , Mah Hui

1985 Affirmative Action , Ethnicity and Integration : The Case of
Malaysia[J].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8(2) : 250 - 276.

Loh , Kok Wah Francis

1992 Modernization , Cultural Revival and Counter - Hegemony :
The Kadazans of Sabah in the 1980s[A]. In Fragmented Vision : Cul-
ture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C]. Joel S. Kahn and Fran-
cis Loh Kok Wah , eds. , pp.225 - 253.

1997 Developmentalism in Malaysia in the 1990s : Is A Shift From
the Politics of Ethnicism Underway ? [A]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Malaysian Studies Conference[C] , 11 - 13 August 1997 ,
University of Malaya , Kuala Lumpur.

Mahathir bin Mohamad

1981 [1970]The Malay Dilemma[M]. Kuala Lumpur : Federal
Publication.

Malacca Guardian

1932 Malaya for the Malays[J]. Malacca Guardian , 25 April , p.
6.

Milner , A. C.

1982 Kerajaan : Malay Political Culture on the Eve of Colonial Rule
[M]. Tuscon :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 Minister of Culture
1973 Asas Kebudayaan Kebangsaan (Bases of National Unity) [M]. Kuala Lumpur: Minister of Culture, Youth, and Sports.
- Minos, Peter
1989 Bidayuh Unity for Economic Progress[A]. In Dayak Bidayuh National Association 30th Anniversary (Souvenir magazine) [C]. Kuching: DBNA.
- Mohamed Suffian bin Hashim, Tun
1976 [197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nstitution of Malaysia[M]. 2nd ed.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inters.
- Morris, H. S.
1953 Report on a Sago Producing Community in Sarawak [M].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for the Colonial Office.
- 1989 The Melanau: An Ethnographic Overview[J]. The Sarawak Museum Journal 61 (Part II, special issue, no. 4): 181 - 188.
- 1991 The Oya Melanau [M]. Kuching: Malaysian Historical Society (Sarawak Branch).
- Nagata, Judith
1874 What Is A Malay? Situational Sele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 a Plural Society[J]. American Ethnologist 1 (2): 331 - 350.
- Nyiri, Pal
1997 Reorientation: Notes on the Rise of the PRC and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A]. In Transformations of Ethnic Identit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C]. Lian Kwen Fee, ed., Special issue of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5 (2): 161 - 182.
- Okamura, Jonathan Y.
1981 Situational Ethnicity [J].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4 (4): 452 - 465.
- Ong, Aihwa
1996 Cultural Citizenship as Subject - Making: Immigrants Negotiate Raci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J]. Current Anthropology 37 (5): 737 - 762.
- Ozay Mehmet
1986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Poverty, Wealth and Trusteeship [M]. Beckenham, Kent: Groom Helm Ltd. Paden, John N.
1970 Urban Pluralism, Integration and Adaptation of Communal Identity in Kano, Nigeria[A]. In From Tribe to Nation in Africa: Studies in Incorporation Processes [C]. Ronald Cohen and John Middleton, eds., pp. 242 - 270. Scranton, Pennsylvania: Chandler Publishing Co.
- Pringle, Robert
1970 Rajah and Rebels: The Ibans of Sarawak Under Brooke Rule, 1841 - 1941 [M]. London: Macmillan. Ratnam, K.J.
1965 Communalism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Malaya [M].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 Reece, R. H. W.
1993 [1982] The Name of Brooke: The End of White Rajah Rule in Sarawak [M].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s, Anthony
1988 [1981] An Iban - English Dictionary [M]. Petaling Jaya: Farjar Bakti.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chmond, Anthony H.
1987 Ethnic Nationalism: Social Science Paradigm [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No. 111: Ethnic Phenomena, February: 3 - 18.
- Ridu, Robert Sulis
1989 Brief Historical Background on the Formation of Dayak Bidayuh National Association [A]. In Dayak Bidayuh National Association 30th Anniversary (Souvenir magazine) [C]. pp. 75 - 77. Kuching: DBNA.
- Roff, W. R.
1980 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 [M].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 Rousseau, Jerome
1975 Ethnic Identity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Central Borneo [A]. In Contributions to Asian Studies [C], vol. 7: Pluralism in Malaysia - Myth and Reality. Judith A. Nagata, ed., pp. 32 - 49. Leiden: E. J. Brill.
- 1990 Central Borneo: Ethnic Identity and Social Life in a Stratified Society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Sarawak Dayak National Union (SDNU)
1971 SDNU Constitution, as amended by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January 1, 1964 [M]. Kuching: SDNU.
- Second Malaysia Plan
1971 Second Malaysia Plan [M]. Kuala Lumpur.
- Schiller, Nina Glick
1977 Ethnic Groups Are Made, Not Born: The Haitian Immigrant and American Politics [A]. In Ethnic Encounters: Identities and Contexts [C]. George L. Hicks and Philip E. Leis, eds., pp. 23 - 35. North Scituate, Mass.: Duxbury Press.
- Shamsul, A. B.
1996 The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 Social Identity: Malayness and Bumiputerness Re-examined [J].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Tokyo) 52: 15 - 33.
- Shamsul, Akmar
1995 Eschew Ethnicity [A]. The Star, 11 September [C], pp. 1 - 2.
- Sharifah Zaleha Syed Hassan
1997 Constructions of Islamic Identities in a Suburban Community in Suryadinata, Leo, ed.
1997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 [M].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Tan Chee - Beng
1994 Communal Associations of the Indigenous Communities of Sarawak: A Study of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M]. Kuala Lumpur: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 1997a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Global Context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Chinese populations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Regional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C], Center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 Champaign.

Tan, Liok Ee

1997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 - 1961 [M].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chibori, Motomitsu

1984 Transformation of Iban Social Consciousness[J].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13:211 - 234.

Vom Roy

1993 The Migration of Kenyah Badeng: A Study Based on Oral History[A]. Tan Chee - Beng, ed., with an introduction [C]. Kuala Lumpur: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Wang, Gungwu

1997 Malaysia - Singapore: Two Kinds of Ethnic Transformations [A]. In Transformations of Ethnic Identit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C]. Lian Kwen Fee, ed., Special issue of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5(2) 183 - 187.

Weber, Max

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 [A].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eds.,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Wheatley, Paul

1961 The Golden Kherso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Malay Peninsula Before A. D. 1500[M].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Whittier, Herbert L.

1978 The Kenyah[A]. In Essays on Borneo Societies[C]. Victor

T. King, ed., pp.92 - 12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cker, Hans - Rudolf

1997 Introduction: Theorizing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A]. In Rethinking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The Struggle for Meaning and Order in Europe[C]. Hans - Rudolf Wicker, ed., pp. 1 - 42. Oxford: Berg.

Yang, Mayfair Mei - hui

1997 Mass Media and Transnational Subjectivity in Shanghai: Notes on (Re) Cosmopolitanism in a Chinese Metropolis[A]. In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C]. Aihwa Ong and Donald M. Nonini, eds., pp.287 - 319. New York: Routledge.

Yen, Ching - hwang

1986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 - 1911[M].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ainah binti Tunku Ibrahim, Tunku

1982 The Meirek: Islamized Indigenes of Northwestern Sarawak——Part One[J]. Contributions to Southeast Asian Ethnography No. 1: 3 - 18.

收稿日期 2002 - 02 - 07

[责任编辑 周耀明]

[责任校对 蒋英菊]

容本镇主编的《悄然崛起的相思湖作家群》出版



地处南国边陲相思湖畔的广西民族学院在半个世纪的办学历史中,涌现出了数以百计的作家、诗人和评论家,逐步形成了一个令文坛瞩目的“相思湖作家群”。这个人数众多的作家群体的悄然崛起,在万紫千红的新中国文坛上,已蔚然成为一种有着别样风采的独特的文学现象和文化景观。对此最近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广西民族学院容本镇教授主编的《悄然崛起的相思湖作家群》作了全面的介绍。该书作为第一部以“相思湖作家群”为研究对象的评论集,既有对“相思湖作家群”的宏观描述和整体研究,又有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微观分析和深入探讨,同时也对广西民族学院在培养文学人才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人才方面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和评价。该书选题新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异彩纷呈,是一部具有弘扬“品牌”优势、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展现作家艺术风采、揭示作家成长规律、推动文学事业发展等多方面内涵和学术价值的研究专集。全书 37.2 万字,定价 28.00 元。(山 兰)